

《唐诗论学丛稿》述评

吴在庆

早就听说黑龙江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傅璇琮先生的《唐诗论学丛稿》(以下简称《丛稿》),但有机会拜读却是最近的事,而且是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尽管此书的大多数文章我早已陆续读过,但通读一遍,更形成了我对此书及作者的更为整体而明确的想法,故略作介绍并谈点感受。

《丛稿》汇集了作者十年中如《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等多部学术著作外的部分单篇论文与学术文章,而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是有关唐诗及唐代诗人的研究和考证的论文,包括《王昌龄事迹新探》、《谈王昌龄的〈诗格〉》、《盛唐诗风和殷璠诗论》、《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天宝诗风的演变》、《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研究》、《〈才调集〉考》、《〈搜玉小集〉考略》等。由于作者有多部功力极深、颇有建树的唐代文学与历史,以及众多诗人生平事迹的研究专著的雄厚功底与积累,因此上述论文与考证可谓厚积薄发,各有独到新颖的见解与发明。如王昌龄的文学成就人口皆碑,但史料的缺乏使其生平事迹长期暗晦不清,人们大都只能就其诗歌风格与艺术成就作些一般的论述,而难以结合其生平经历更具体扎实地探讨其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发展变化关系,并研究其诗论对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进而探索其诗歌与诗论在唐代文学、文论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可以说对王昌龄生平事迹的新发明与对其《诗格》的肯定,这

不仅对王昌龄研究本身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而且对盛唐诗歌、唐代文论的发展描述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璇琮先生选择对王昌龄事迹与其《诗格》的研究,就是站在统览全局的高度而进行的,因此这一研究角度本身即是在高屋建瓴的对文学研究进行宏观审视的微观的个案研究的显例。由于作者对唐代历史文化的谙熟与敏锐的洞察力,也有赖于其精密严谨的考证功力,因此在王昌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在生平仕历上,他的新发现有王昌龄在开元十一年有河东之游;开元十四年秋曾出塞,由甘肃靖远附近的白草原由西向东,经萧关、固原、平凉城、凤翔、岐山、扶风等地返长安;他任秘书省校书郎在开元十九年中博学宏词科后,开元二十二年又复登博学宏词而授汜水尉;其由汜水贬官及由江宁丞贬龙标尉分别在开元二十三年与天宝九年或十年秋。在文论方面,璇琮先生从皎然《诗式》与空海《文镜秘府论》所提到及引用的《诗格》内容,以及它们和王昌龄的行踪关系的精细比勘,证实《诗格》确属王昌龄所著,并可能作于贬龙标尉时。这些颇有说服力的发现,既体现作者深湛与精采的考证功夫,也使王昌龄的研究刷新局面,一下子提高到最新最高的研究档次。又如《天宝诗风的演变》一文,是研究文学演变的论文。与某些好谈文学规律轨迹的空廓文章不同的是,本文的论述是建立在深厚的实证基础上的。文章以十分具体厚实的事例清晰地勾勒出天宝时期诗风

变化情况,提出令人信服的精辟见解。如认为“纵观天宝时期的诗坛,使我们感觉到不少诗人似乎从开元盛世的光圈中走出来,他们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幻想式的雾气,而逐渐学会用一双清醒的眼睛来看现实,我们发现他们饱含诗意的眼神中竟如此的忧郁,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深刻的不安。”而这正“是那个时期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情绪,而在文学上,这种诗化了的深刻的不安,则是天宝诗风的基调”。这一见解是建立在对此时期不同作家群的不同反映的文学事实之上的。如分析张九龄的《感遇》组诗后,指出它“保持着盛世志士风度,同时又有着一一种预感到不祥变化的不安情绪,尽管这种情绪还是很朦胧的,但却正是盛唐诗人从理想的追求转变为对现实的不平的表现,既表明诗人清高超脱的政治态度,也体现诗风转变的最初趋势”。又如在对不同诗人群体的具体分析中,又指出“当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执政之际,文坛上还有两类诗人活跃着。一类如王昌龄、常建、李颀等久已入仕或刚刚擢第的诗人,他们关心政治,并不超脱现实。另一类如李白、高适、杜甫及岑参等尚未入仕,犹属布衣的诗人,他们还都满怀壮志豪情,展望远大前程。而使天宝年间诗歌波澜起伏、绚烂壮观的,恰是他们的创作,尤其是李白等人”。这样一种建立在文学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发展变化轨迹的描述,使我们对天宝时期文学的了解更加具体与丰富厚实,并识察到其间微妙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原因。因此这一描述不仅令人信服,而且使读者随着作者的思路与眼光,也仿佛一同站在天宝文学的历史高峰上,鸟瞰着这一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的起伏波浪,清楚地看到其流向。这里我想进而指出的是此书的不少论文均与此文相似,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与意义,不仅在于其论点本身,而且更在于研究方法上。也即是说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建立在大量的十分具体丰富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与

社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从而据此进行冷静与科学的理论审视与概括。同时,璇琮先生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源于丹麦文学家奥尔格·勃兰克斯的“注意于社会生活与文学流派的多样化联系,并努力从整体上来把握作家群的时代情绪和心理活动”的方法,确实是可行的,值得仿效的。如上所述,《丛稿》第一部分的其他文章也大都具有上述特色,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对此罗宗强、陈允吉两先生为本书所撰写的序言都提出了精当的看法,给予了很高而中肯的评价。综观璇琮先生的论著,我十分赞同两序所精辟概括的璇琮先生治学方法的特色。如罗序提出“璇琮先生是明确地朝着整体研究的方向开展他的工作的”,“目的都是认识一个时期文学的总的风貌,对这风貌作出解释与评价”。这种整体研究,如果概括的说,似乎可以称之为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它是从传统的考据方法中生发出来的,非常重视实证。它非常注重个案研究,把个案研究做得很深,从个案研究中认识历史的整体联系,认识历史的进行线路”。同样陈序也提出:“璇琮先生确认古典文学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其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将古典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亲缘学科,特别是文学(还包括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结合起来进行交叉和综合的研究,从一个时代历史文化的整体运动中来审视它的价值和作用。这种研究不妨称之为对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所评极为精采,读者可以借以了解此书及傅先生的治学方法。

本书另一部分是为友朋所撰写的二十篇书序及评价闻一多唐诗研究与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虽说多是书序,但实是论学文章,从某一角度讲我以为它的作用与意义比起前一部分更为重大,是极少人所能企及的。我以为其中三点尤值提出。其一,序言并不局限于某人某书,而常借以提出具有指导性的新课题,开辟新的研究角度与领域。如在

《点校本〈五代诗话〉序》中认为：“五代十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由中古到近古，是由五代这六七十年间完成的。五代，它在各方面说是一个过渡，但这个过渡在历史上却带有关键性质，只有透彻地研究这个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宋代及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诸形态才能有清楚的了解。”在另一序中又提出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发展到现在，“需要有人作一种科学归纳的工作，把能够成立的，符合于文学史实际的，就作为定论肯定下来。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所必需做的学术积累的工作”。其他序中又指出：“还有不少作家作品可以建立学术史的，我们还应该有乐府学、唐诗学、元杂剧学等等。开展学科史的研究，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中晚唐时有不少作家，他们往往有一种爱情上的失落感；”“我们现在应该以这种谨严的学风大力开展专书的研究”等等。其二，对优良的治学方法与态度的一再肯定与提倡。序中多处针对研究现状谈及应该具备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并加以提倡肯定，对全面掌握整理资料的重视，对强调实证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文史结合、进行慎密考证的注重，以及对“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十年磨一剑”“舍易就难、舍热就冷”“朴质、敦厚、脚踏实地地耕耘”“学术上的坦诚与谦虚”的学术品格的肯定与赞扬。同时，序中在肯定采用包括宏观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也批评了学术研究中的“短期效益”“朝立一说，暮成宗主”的虚浮学风，指出“学术上的一些基本工作，是不应该受什么‘热’的影响的”，并针对相当长时期中“过于强调研究规律”现象以及认为“只有能提出或发现什么规

律性的东西，才是高水平的研究”的片面看法，提出应该首先“理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等等。其三，对后辈学者的热情扶掖与鼓励。由于璇琮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也更因为他的为学人所钦仰的高尚人品，许多后辈学者都以能获得他的撰序为荣幸，并借以引导、激励自己。他为拙著《杜牧论稿》所作的序，即起到了这一引导激励的作用，在我的学术研究道路上获益匪浅。璇琮先生说他有慨于此前的文化环境，在序中“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以“相濡以沫”。即就这“相濡以沫”一点而言，它对于后辈学者坚持优良的学术品格，掘弃俗念而踏踏实实地从事学术研究曾起过多么大的激励作用。

《丛稿》等多部著作不仅展示了璇琮先生极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也显示了他为人钦仰的学术品格与人品，在学术界产生了人所共知的影响与作用。如果再联系到他更为大量的热心指导、扶掖、激励与帮助后学的具体工作，我有一个逐步明确的想法：在最近十多年的古典文学研究界中，能对众多后学起着引导作用，促使唐代文学研究形成一支踏踏实实地钻研，并屡有创获的中青年研究队伍，在其中起重大作用的前辈学者中，璇琮先生是最突出者中的一位。因之，我很赞同刘石同志在《实学研究与文化探索》中所说的，如果将来有人“做一本当代中国的学术史，里面如果不出现璇琮先生的名字，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赵永建]